

分类号 _____
U D C _____

密级 _____
编号 _____

兰州财经大学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_____ 产业政策有效性分析
_____ ——基于长三角产业演化的实证研究

研究生姓名: _____ 于泽方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_____ 蔡文浩 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_____ 应用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研究方向: _____ 流通创新与贸易经济发展

提交日期: _____ 2021年5月25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提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于译方 签字日期： 2021.5.25

导师签名： 蔡文浩 签字日期： 2021.5.25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_____（选择“同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1.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于译方 签字日期： 2021.5.25

导师签名： 蔡文浩 签字日期： 2021.5.25

Analysi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Industrial Policy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evolution of Yangtze river delta

Candidate : Yu Zefang

Supervisor: Cai Wenhao

摘 要

在现代中国产业的演化进程中,产业政策始终都是各级政府主动引导产业演变的方向,调节各个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产业演化的重要政策工具。本文探讨了政府所制定与实施的产业政策对长三角产业演化是否具有正向促进效果,其作用机制是否是产业政策通过调控市场主体互动来推动产业演化的进程。基于长三角地区四位数制造业的实证研究表明,空间溢出可以通过“水平关联”、“技术关联”和“投入产出关联”来实现,不同的溢出路径受产业政策的调控影响不同。技术关联和投入产出关联溢出高度依赖于企业间的紧密互动,显著受到产业政策的调节;水平关联溢出对企业间互动的依赖程度较低,受产业政策的调控较少。长三角在制定实施诸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稳定经济增速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等相关政策时,也应该更加致力于制定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实际需求的相关政策模式以配合市场,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与市场职能的相互协调和配套作用,不断完善并协调相关配套产业政策,促进中国区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体化水平的提高,推进产业演化进程深化。

关键词: 产业政策 水平关联 技术关联 投入产出关联 产业演化

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dure of industrial upgrade in modern China, industrial policy tend to be a policy tool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functional departments actively guide the direction of industrial evolution, regulate the communication of enterprises in distinct areas and accelerate the procedur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investigate how the industrial policies formulated and implemented by the government can positively update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rocess, test and verify the principle whether or not the industrial policies promote the industrial evolution by regulating the interaction of market subjects. This empirical research with four-digit manufacture across the region of Yangtze River Delta represents the phenomenon that spatial spillover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horizontal correlation", "technical correlation" and "input-output correlation", but different spillover paths are affected differently by the regulation of industrial policies. Technology correlation and input-output correlation spillover are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close interac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are significantly regulated by industrial policies; Horizontal correlation spillover does not necessarily depen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is less constrained by industrial policies. While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relevant policies such as innovation-based programme of development, keep economic grow

steadily as well as intrinsic mass,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hould also devote more efforts to formulating and establishing policy measures that are in line with reality, cause the maximum amount of complete set of system function and coordinated well with each other, uninterruptedly consummate and harmonize form a complete set or system of industrial policies, give an impulse to the burgeon of the integration extent of economic as well as community expand in China district, push the course of industrial evolution go deeper forward.

Keywords: Industrial policy level ; Horizontal association ; Technology association ; Input-output correlation ; Industry evolution

目 录

1 引 言	1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2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3
1.2.1 研究内容.....	3
1.2.2 研究方法.....	4
1.3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5
2 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6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6
2.1.1 产业政策有效性研究.....	6
2.1.2 产业政策与空间溢出的关系研究.....	10
2.1.3 空间溢出与产业演化的关系研究.....	13
2.2 理论基础.....	16
2.2.1 产业政策对产业演化作用机制.....	16
2.2.2 产业政策、空间溢出与产业演化作用机制.....	20
3 指标构建测算与数据说明	23
3.1 变量定义与说明.....	23
3.1.1 产业政策的指标构建.....	23
3.1.2 产业演化的指标构建.....	25
3.1.3 控制变量.....	26
3.2 数据来源与说明.....	27
4 实证分析	28
4.1 产业政策与产业演化.....	28
4.1.1 模型构建.....	28
4.1.2 实证结果分析.....	28

4.1.3 稳健性检验.....	30
4.2 产业政策、空间溢出与产业演化.....	33
4.2.1 模型构建.....	33
4.2.2 实证结果分析.....	33
5 结论及政策启示.....	37
参考文献.....	38
后 记.....	43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上海要进一步发挥龙头的经济带动支撑功能,苏浙皖各扬所长,加强相邻区域企业间的跨区域交流与合作,探索毗邻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改革创新机制。通过促进科研人才有效地流动与科研资源共享,整合长三角区域性科技创新产业资源,推动多层次产业跨区域转移与所需生产要素的双向融合流动。中央、地方各级政府的灵活政策导向为资本市场注入活力,打通从原始经济创新驱动到现实经济生产力创新转变的绿色通道,对推动与省际毗邻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深化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形成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资本市场的经济管理体系,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从项目协同式发展走向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度管理创新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在制度层面分析,长三角地区的改革开放和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大体上采用了地方分权+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市场化改革和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就是当前的地方人民政府和当地新兴企业家之间所建立形成的市场联盟机制,在这样的市场机制布局下,市场机制就是在当前的行政权与其他市场行为之间在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状态中逐渐形成、发展、并逐步完善起来。合理设计的各类产业政策可以被视为对市场的有效补充,有利于尊重和充分依托市场机制,推动各类政府举措与社会主义市场力量之间形成协同,令各类产业政策的审慎制定都是基于社会主义市场对其在经济和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一种决定性影响这一前提条件下。所以本文将通过对长三角区域内产业政策的调控作用和市场实体力量之间的相互协同与优势互补的关系进行分析考察,本文系统地确立了一种产业政策调控区域空间溢出的方式体系,并为产业政策对区域间经济关联的影响构建了微观基础。该空间溢出路径是在“水平关联”“技术关联”以及跨行业的“投入产出关联”的基础上构建的。许多研究提出了类似的框架探

讨了产业间溢出效应的实现路径,本文进一步从区域经济主体之间互动这一视角出发,分析了政府产业政策对区域三条溢出路径的调控作用及其对不同路径溢出的差异性影响,将产业政策与企业间互动联系起来考虑分析,以此建构政府产业政策影响地区间经济关联及其差异性的微观基础。

1.1.2 研究意义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将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该定位将进一步加强长三角地区的社会经济创新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对于促进长三角地区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提高具有重大意义。长三角持续快速发展,逐步成为当前中国综合实力最高强的经济中心,主要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三省一市,统一地协调和规划相关的新兴产业政策必然能更好地提高长三角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一体化程度,推动整个区域经济与产业的演化进程。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和制度性要素如何协调适度地为这一战略的实施和执行服务。深入探讨产业政策如何对长三角产业演化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角度,可以成为中国建立和完善长三角经济带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借鉴和参考。

实践性证据显示,产业政策有效与否并不存在一个通用的模式,它主要取决于我们发展产业本身的特点,面临的制度环境,发展所采用的政策手段以及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等众多因素的联合作用。近期研究开始转向探索产业政策制定实施适用于具体经济环境产生积极效应以及效率更高地发挥产业政策优势的条件。当下中国正在尝试通过一些有为政府之手来及时弥补面临的市场失灵现象,产业政策的频繁实施和使用便是它的体现,政府通过实施产业政策实现资源的再配置,间接有目的地引导企业发展方向,推动产业演化向预先设定的方向发展。从产业政策这一角度阐释了产业演化的驱动力所在,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地方经济的发展依赖于一定的空间网络联系,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的逐渐深化为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平台,加强了区域间市场主体交流与合作的机会,机会的增加也伴随着风险的增加。最大化实现主体间经济交流互动空间溢出的正向影响,弱化伴随发展过程中的负向影响是当今亟待解决的政策

制定困难之一。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产能增加的高质量经济发展的核心便是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又是以产业演化为基础的。产业演化往往产生于核心前沿科技的突破创新发展，从理论上讲，处于一定空间范围内的经济主体互动交流产生的空间溢出将对于减少发展进程中的损耗以及产业发展阶段的不确定性具有不可忽视的正向作用。从理论和实证上研究产业政策如何影响空间溢出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政策建设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和微观机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不同经济实体间的互动会受到产业政策的非均衡性影响，进而形成差异化的互动特征。产业政策将影响不同级别的实体（例如企业，行业和地区）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政策作为一种确立经济生产、贸易活动与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的政策，是一种明确的社会、政治及相关法律规范性的准则，为贸易活动提供了市场驱动力，构造了经济贸易和市场活动的支持和激励，从而通过产业政策调控各种市场活动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因而，产业政策被认为是调节区域经济空间溢出的有效政府举措。因而，要达到从更广阔的视角探索政府产业政策对空间溢出的影响方式与原理，就应从空间溢出的产业间非均衡性角度切入，更有助于拓展政府产业政策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研究。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2.1 研究内容

通过分析研究长三角地区产业政策、空间溢出与产业演化之间的关系，探讨长三角产业政策有效性。文章不仅思考了政府要不要实施产业政策，而且验证了产业政策对地区间“水平关联”，“技术关联”与“投入产出关联”的调节，以及它们对于企业互动与产业演化的影响。本文试图为政府部门在长三角地区合理制订与执行长三角的产业政策时，提出一些有效的建议。本文试图解决以下问题：

（1）产业政策对长三角产业演化有着怎样的影响。（2）产业政策是否通过调节区域间“水平关联”，“技术关联”与“投入产出关联”影响产业演化。基于此，本文探讨了产业政策、空间溢出与产业演化关系的问题，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引言。

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的背景与意义、所关注内容及使用的研究方法、可能的

创新点。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主要梳理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争论、产业政策对空间溢出的调控作用、空间溢出对产业演化的促进作用，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相关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主要内容是以长三角企业 2003-2009 年已有的研究数据为基础，研究样本定为 2003-2009 年的长三角企业数据，使用 Logit 模型方法进行分析，实证检验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实施对长三角地区产业演化的有效性以及产业政策通过影响空间溢出对产业演化的调控效果，不同溢出路径受到产业政策的调控影响程度不同，地区关联溢出对区域产业演化的促进作用效果也因此存在差异；利用 Stata15.1 对数据进行统计性描述并展示实证结果，对实证结果进行相应的分析；最后进行了相应的稳健性检验。

第四部分：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部分对主要的研究内容以及结论进行了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2.2 研究方法

本文搜集了大量的关于产业政策、空间溢出与产业演化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相应的归类和总结，分析了目前的研究方向与研究结论，学习了前沿的科研成果与所用方法，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产业政策、空间溢出与产业演化之间的联系与影响，总结出目前科研可能尚待探索的问题。其次，采用长三角企业 2003-2009 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样本，采用 logit 模型对其进行了分析，并对提出的相关研究成果的理论和实践结果的分析方法进行了综合对比验证，分析并总结得出了相应的研究成果结论。最后，为长三角政府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和探索性的对策建议，具体方法说明如下：

(1) 文献研究法：搜集与研读产业政策的相关科研成果，通过归纳、概括等方法对所获成果进行归类总结，探索产业政策、空间溢出与产业演化的研究发展进程，得出其研究的整体框架，进一步提出了三者之间的影响机制。提出产业政策经过调控区域间经济互动与联系路径影响区域产业演化，且产业政策的调节

作用对不同路径具有差异性。在现有理论和所采用的方法等前人相关经验的基础上，选取了合理的度量指标和衡量方法，收集和整理了长三角企业数据。

(2) 实证分析法：以长三角地区企业 2003-2009 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采用 Logit 模型方法进行了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产业政策的出台与执行对长三角地区产业演化的影响以及产业政策通过影响空间溢出对产业演化的调控效应，并对其研究理论结果进行了验证，分析了研究所得结论。最后，为政府实施产业政策提供了具有探索性的对策建议。

1.3 可能的创新点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有：第一、为产业演化的动因提供了一个来自于产业政策力量和企业活动的协同互补视角的理论支持。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目前对于中国现有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常常忽略区域内企业间的经济互动所带来的技术交流和资源重置对区域产业演化的可能影响，把主要关注点集中在已经受到了产业政策扶持的企业上。

第二、在实证检验中，从长三角政府产业政策实施的力量与资本市场力量两个角度出发，分析了长三角产业政策实施效果，分析了产业政策对不同空间溢出路径所可能产生的调控作用，拓展了现有关于政府和市场职能互补性的视角来研究产业政策有效性的文献。尤其是当前中国特定发展阶段将长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进程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时，为地方政府合理制定与实施长三角区域产业政策提供了借鉴与参考，丰富了试验区相关政策的实施以及相关课题研究。

2 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2.1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2.1.1 产业政策有效性研究

从对产业政策的具体实施和执行以及在实践应用成果分析来看,虽然当今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在不同的产业经济社会形态和发展阶段普遍地采取了相应的产业政策,但是这些产业政策的具体实施及其效果却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个产业政策,其在不同的企业中实施的产业政策效果也很有可能相去甚远(陈永清等,2016)。一方面,不论是处于追赶过程中的发展中市场经济体,或者是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自身领先优势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体,均曾或多或少地将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产业政策运用于推动经济发展的进程(林毅夫,2017)。从其实践情况来看,16-17世纪的英国,19世纪中叶的美国、德国与法国,以及二战后急需恢复经济生产的日本等,在其全力实现这种政策目标追逐期间均将产业政策作为有力武器来促进其产业的快速恢复与发展,实现了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为其新兴产业政策有效落实提供了坚实而又充分的基础与保障(戚聿东和张任之,2017)。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资料,即便是处于全球性和发展最前沿的美国,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研制投入中,还只有将近40%以上的资金来自于政府,特别是在周期较长、而且风险较大的领域进行了基础性的科研创新投入。

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为了实现中国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政绩目标,相关产业政策部门在现有晋升机制的影响下,竭力运用自身可控的社会资源和方法手段来促进本地经济发展,扩大地方政府社会财政收入来源(王贤彬和徐现祥,2014)。这通常都是靠着政府实施产业政策调节市场行为以间接对生产率和价格产生相应的调控作用才能够实现。政府官员为了在其任期内快速扩大当地的社会经济总量和增加税基,各级政府需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出台各种与当地产业相关的法规和优惠政策,以期实现当地产业生产水平提高与资本积累等目标,最终由企业生产率的增加而带动其他财政税收收入的增加。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往往会需要地方政府部门进行控制或者干涉某些需求要素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市场配置,这通常都是通过制定实施新兴产业政策以对其施加

政府力量的影响而实现。产业政策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与其作用机制,是一种由地方政府组织及其机构的产业政策决定和执行机制,其通过收集和处理这些产业信息,然后把这些产业政策信息和其指令传递给企业和市场(Farla, 2015)。政府部门主体可以根据自己对本地区产业发展现状研究和对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基于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整体宏观目标,向众多或者个别的产业发布具有针对性的信号引领指导或项目计划指示,以调节资源在既定地区内产业部门间以及在产业部门内部企业间的分配,最终完成产业规模与结构向其预定目标状态的转变与发展。

市场并非万能,产业的持续发展过程中往往会面临各种外部性、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经常地还会出现一些企业投资的过度或投资不足,以致于出现企业产能一定程度过剩或价格过度波动的特殊情况(hausmann&rodrik, 2003);各类大型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并不健全,如针对某些金融行业的各类金融市场、产品和金融服务不健全、企业也自身很有可能无法完全地依赖于这个金融市场实现跨期主动配置的市场资源(stiglitz, 1993);一个企业自身无法通过自主经营完成各种技术应用研发、资源配置以及产品生产的市场决策,使一个企业经营中具体多种市场决策方式相互匹配相互协调,从而导致使一个企业自身无法真正实现有效的市场资源配置(Rodrik, 1996)。产业政策一般是基于中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职能部门对本地企业大量政策数据资料的整理搜集、分析、整理总结以及经过各级职能部门反复调查分析研究后进行综合评估的成果,地方政府政策出台所提供的重要政府信息和行业资金流的主要信息风向,在产业市场机制不健并且在较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整体根本性有效改善的客观条件和实际情况下,及时有效地修补当下地方产业政策制定与实施所面临的外部性、信息不完整和不对称等缺陷所产生的问题,防止企业盲目地增资、非理性扩大工业生产规模,同时减少产业结构不合理形成的各种利益冲突和企业之间的摩擦,加快关键产业领域的人力、物质供给增长速度转换来优化综合配置,将传统的产业生产要素资源重置成本水平减少到一个相对较低的成本水平,促进整个区域的产业发展演化。

由于中国过去以及当前的发展面临着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化的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时期,发展同时市场体制也有待健全完善,产业的生存与发展极有可能因为其投资所面临的信息的不完整性和信息不对称、投资生产面临较大的负

向外部性,企业生产所处的各条产业链配套设施不够完善,与此同时当前中国还处在并将长期处于对发达经济体追赶赶超的稳中求进发展进程中,产业的变化与更替也越来越快,很有可能随之而来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产业波动,市场中的部分运转效率与社会福利损失便是由这些追赶进程中的产业波动带给我们的(林毅夫,2007)。处于这样的发展背景下,有关政府部门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网络组织力量,在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区域范围内对相关特殊产业采取政策的支持来有效弥补其市场缺陷,减少对区域产业发展呈负向影响的市场摩擦,提升某些特殊行业资源配置的科学和高效性,提高其他产业资源配置的科学有效度。

理论上认为适当的产业政策可以帮助和促进产业科学与技术创新的发展方向,提升产业科学与创新的效率(Peters et al.,2012)。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改造升级要求技术企业自身应当同时具备一些必须的硬性和软性公共服务基础配套设施,突破与推动产业中高新技术公司创新转型升级的初始阶段资本投入限制、将其密切相关的一些外部性业务内部化以及适当减少其中的资本不确定性和潜在的社会风险,提高实现产业创新升级战略的完成概率。其中主要包含了特定企业专利或者权益安全保护支持政策、风险投资支持基金、公开技术研究和应用基础设施平台甚至可以是各种类型的专业人才支持政策以及扶持等(Pack&Saggi,2006)。即使一个发达国家或者某些地区的多数新兴产业和科学技术始终位于全球乃至世界技术的前沿。在实现对新兴产业和科学技术追逐时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便是通过政府有关部门适当地采取一些新兴产业政策,对一些新兴产业进行鼓励和引导,发展本地重点新兴产业,同时通过“干中学”方式来促进落后企业的创新和转型升级。实际上,在中国现有产业政策的调控机制下,政府部门能够通过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重大科学技术创新攻关项目计划、财政补贴和信贷扶持等措施计划的有效运用与调整,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分散和承担产业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等过程中的市场不确定性和风险,汇聚社会资源与支持力量积极投入到推动创新的进程中去,以便于充分将产业科学技术研发的社会经济效应和资源的集聚效应转化为推动了产业科学技术创新的动能,推动具有国家前瞻性领域的主导优势产业、新兴科学技术类产业演化进程,从而提高了中国地区产业结构的发展高度化与各产业比例合理化。中国大部分产业研发及生产与世界技术前沿还存在不可忽视的差距,现代工业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能够极大地

增强整个中国和其他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动能,而其都必须克服巨大的社会不确定性、风险、外部性和实施协调等社会问题,从而必须由中国地方人民政府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带头来予以支持和主导这些社会公用物资的分配与使用,而地方政府则是在其中央引导及其政绩目标的推动下也是有动机可以促进相应政策的出台。

针对当前中国经济近几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拓展与深化而接连出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过剩”问题,地方各级出台的重点新兴产业政策虽然从制度整体上有效提高了重点产业的平均生产率,但是仍然普遍存在着较大的产业异质性(宋凌云和王贤彬,2013)。陈钊和熊瑞祥(2015)把国家级进出口产品加工重点地区企业作为其政策研究的主要对象,发现“主导产业”的政策扶持确实可以有效地用于促进那些本身已经具备相应的一定比较经济优势的行业内中小型加工企业的产品生产和服务出口,而对原先并没有具备一定比较经济优势的产业不会对其产生显著的经济影响。

与许多正处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在广泛地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培养新兴产业来促进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发展模式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转型的大背景下,国内专家和学者针对新兴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应用以及新兴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产生了广泛的研究与讨论(陈永清等,2016)。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相继出台实施的一系列产业政策也充分表明,带有中国特色的促进工业生产的现代化和遏制工业生产过剩的一系列产业政策已显示其强大的监管特点,直接阻碍了其市场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竞争(江飞涛和李晓萍,2010)。基于中国地区与产业相关资料的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预期设定的政策目标,政策执行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平会对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造成一定的限制,与此同时,当地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还取决于地方政府机构的执行能力(韩永辉等,2017;孙早和席建成,2015)。

落实产业政策的相关举措一开始可能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受扶持产业短时间内实现规模拓展,产能增加;但我们不能忽视市场为了获得产业扶持,盲目扩大生产,转变生产结构的可能,随之出现发展过剩的局面,因而结果可能会是失败的。到目前为止中国实施产业结构优惠扶持政策的具体情况来看,存在着以下几个基本方面的问题:政策涉及范围明显过宽;许多产业政策实施举措不够

恰当；政策性的配套支持措施相对缺乏等。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在目前中国的产业和市场经济体制仍然长期地处于一个经济转轨阶段的发展历史进程的背景下，由于目前中国的产业政策体系和其行为机制还有待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特别要归咎于中国缺少切实有效的执法和监督机制，盲目依赖与信任政策的影响和效果，过度地依赖于政府产业政策执行实施过程中的各种行政方式和手段，因而并没有更加注重结合各种市场机制对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检验与完善，最终造成了执行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市场运行的普遍规律相背离。

另一方面，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失败的案例也是不在少数，即便是现在已经发展成功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仍然存有大量被普遍认为无效的国家产业政策。就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和日本就先后制定将本国的一个支柱产业定为现代航空制造工业的发展战略，接着又大力倡导发展第五代电脑、仿真技术、移动通信等新兴产业，这些发展战略举措也只是作为无效的新兴产业发展战略政策和典型的案例供后人借鉴。一项学者关于土耳其政府实施的产业政策举措的分析研究表明，在土耳其工业中，未能得到相应产业的产业政策保护的行业或企业，其生产率的增加反而比得到扶持行业更加迅速(krueger 和 tuncer ,1982)。Blonigen(2016)通过对 1995-2000 年期间从事钢铁工业的下游地区中外贸易企业进行跨国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出口补贴与非关税壁垒的实施反而大大降低了密集型生产和使用钢铁的下游地区中外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由此可见，关于产业政策制定与实施是否有效的辩论事实上并不存在肯定性结论。

2.1.2 产业政策与空间溢出的关系研究

作为建立生产，交换和分配的政治，社会和法律规范，产业政策为贸易创造了动力。因而，产业政策被认为是影响空间溢出的主要因素之一。产业政策在不同主体之间传导与实施差异会影响经济互动而对空间溢出产生一定影响。制度变量也决定了某地将其临近地区的生产要素与人才要素转化为推动工业发展动能的效率。良好的政府产业政策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无形资产，广泛推行在扩张区域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地理上的邻近促进了区域之间技术和有效信息的交流。以往研究表明：邻近地区空间溢出常常对地方产业演化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目前的研究通常是建立在邻近地区的所有公司都具有相同的空

间溢出潜力这一基础之上的。但是，中国实践证据显示，空间溢出是不均衡的。市场主体间的联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产业政策的调整，市场主体间的相互联系与生产要素交换又是空间溢出的基础，因此企业的互动将受到产业政策的影响。

空间溢出依赖于各企业在一定空间内的相互作用，以企业互动为基础。但市场中企业之间的交流联系作为一种市场关系，而非一体化经营，互动中往往面临着市场交易对手的机会主义困境。产业政策通过调整交易成本和降低市场交易不确定性为企业之间的互动奠定了基础。良好的产业政策可以提高行为的可预测性，并减少交易成本对企业之间协作的威胁。全新的业务领域对跨区域进行经济交流与互动的企业既是新的发展机遇，也是一个充满不确定可能的挑战。因此为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企业往往会趋向与相关产业政策完备，权责规定明确的区域进行交易与互动，以此增强信息对称性与减少交易对手机会主义钻空子的行为。由此可看出，完备且良好贯彻实施的产业政策可为企业间彼此信任奠定良好的合作基础与前提，对企业间互动与交流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葛鹏等，2016）。

产业政策对区域之间可能的交易模式具有较大的决定性作用。广义的交易行为，包括企业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系统，涉及多元主体。信任为协调合作与互动奠定了基础。Olson (2000) 认为，虽然初级市场交易无处不在，但在相关政策制度健全且得到良好实施的国家，复杂交易进行的频次却远远高于制度政策有待完善的国家。制度环境极大地影响了该地区的信任度，即与该地区进行往来可能产生的交易成本。尽管信任可以通过家庭联系或社会关系如友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事实上其根本的建立是以地方产业政策的明文规定法律法规所赋予的强制性保障。回顾中国的产业发展历程，产业政策完善程度对区域间企业互动的信任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尽管如此，如果将每个区域视为一个系统，现有研究大多从区域经济整体视角来评价产业政策对空间溢出的影响，较少考虑区域内经济体不同结构的产业间受政府产业政策措施调节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缺陷限制了对产业政策影响空间溢出的微观机制的理解。虽然已有研究基本一致地表明，与市场需求相违背的产业政策的制订与实施会对市场的运行以及市场主体间的信息交流与企业

合作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从而不仅对空间溢出产生限制，甚至与政策制订本意相去甚远。但是，制度环境是影响经济行为的基本因素，而经济主体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其运行建构于不同的行为逻辑之上。

从上下游生产链的纵向维度来看，生产要素供应商、生产者、最终消费者之间，甚至拥有研发共性内容环节的经济实体均需通过区域网络互通交流来实现生产与流通环节的资源最大化利用以及更高效的产出。对于横向维度的企业之间却并非如此，处于同一产业领域内的企业之间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且相互之间的人才要素，生产要素流动对其信息的获得，创新生产方法的学习都较为容易。(Malmberg and Maskell, 2010)。不同角度的空间溢出路径对企业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有各异的需求和深度。同样，同一产业政策对不同空间溢出路径的监管与规制影响会有所不同。

在与产业技术关联的溢出路径，企业通常采用协作形式，例如委托研究或协作研究。这些方法要求公司进行一定数量的初始投资，这些投资可以提前被视为专用性资产。这意味着公司需要特定的治理机制来确保减轻合作伙伴完成所需合作任务的风险。然而，研发活动的不确定性很高，通常难以建立可靠的治理机制，而且运行成本通常也非常高昂。因此，政府产业政策的漏洞也为企业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钻政策漏洞的灰色地带。产业间技术关联的溢出路径由于其所需技术的学习与交流，专利成果的共享与保护，往往关联到众多复杂的企业间合作问题。比如，如何增强双方合作的连贯性与一致性，如何在谈判和协商过程中降低交易成本，如何缓解经常存在合作与竞争往往共存的冲突等。这些合作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正式制度，该制度明确规定了各方的责任和权利，以及适当的监督和惩罚机制。这样做不仅有助于使得双方在协议中能够根据自己的资源需求更大程度上实现互补或者协调发展，而且也有助于减少双方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贸易行为并且大大地降低了企业合作的风险。

在企业间水平关联的溢出路径角度来看，企业间生产要素，人力资本，商业信息等要素的传播与交换，促进企业的发展进步，推动了水平空间溢出。制度环境中的缺陷，例如市场化程度较低或者地方保护主义等可能限制地区间的要素流动，从而不利于企业获取正向的空间溢出。但是，产业政策与相关举措所营造的地区信任对产业间水平关联的影响相较之下便不甚重要。即使企业间交流互动频

次不高，影响也不显著（Malmberg and Maskell, 2010）。行业内的水平溢出通常表现为知识的单向传播。此类正向外部性促进作用来源或是企业间无意识地扩散、交换与转移相关信息等渠道（Kokko, 2000）。各区域还可通过积极学习与模仿周边地区的领先技能和管理方法，或通过对先进地区的模仿和同构来促进产业升级（毛琦梁和王菲，2020）。

2.1.3 空间溢出与产业演化的关系研究

区域产业的演化还取决于企业之间在特定空间内的联系所形成的空间溢出。尽管影响产业演化的机制错综复杂，但这与基于知识的生产基础的建立是分不开的。区域是一个开放系统，学习机制可以在跨地区范围内实现，随着经济复杂度的不断提高，跨产业网络的知识转移对于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企业间的互动已成为产业不断演化发展的关键之一。企业网络关系中包括同一行业中的竞争企业、合作企业、相关行业中的专业供应商和制造商等，并且在许多维度也存在互动交流，例如正式或非正式，纵向或横向交流。通过企业之间的模仿同构，共同创新，技术扩散和其他形式，有利于增加创新的可能性，减少对创新的投资并降低创新的难度。

本地化的生产模式能够通过相互联系连接的生产网络促进企业之间的各种要素资源交换与共享，降低了企业之间的贸易成本和运行风险，最终给企业带来外部经济。Marshall (1890) 首先从三个维度总结了集聚经济：劳动力蓄水池，中间投入共享以及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进一步总结概括上述三个维度，即“人”，“物”和“知识”。从生产所需技术与信息溢出途径来看，Jaffe (1998) 从知识性溢出、产业关联性溢出和市场性溢出三个方向对产业间溢出的形成进行了分类。知识传播通常涉及知识要素的扩散，例如思想的传播，技术转移和人才流动。市场溢出通常是通过产品交易来实现的。通过中间产品的投入产出关联，特定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将影响上下游产业的技术进步或质量提高。具有相似技术结构的企业有相互学习或合作研究共同技术环节以产生产业关联性溢出的强烈动机。该地区新兴产业的发展依靠与技术相关的产业来提供必要的能力，知识和潜在的企业家 (Boschma et al., 2013)。

此外，根据主体之间各种互动形式的差异，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空间溢

出：①企业之间对产品，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模仿与培训。②各行业之间人才流动促进知识传播与扩散；③知识可以物化于产品之中，溢出效应将通过贸易或投资渠道实现；④联合研发有助于企业之间信息的扩散与交流，促进创新的发生。通常，学习和模仿机制主要发生在同一行业的企业之间，从而导致行业内更多的水平溢出。人力资本流动机制是实现产业间水平溢出的重要途径。具有共性基础研发要求的企业往往追求相互合作以降低研发成本与风险，从而导致产生技术关联性溢出。

总体来看，空间溢出主要是通过“水平关联”“技术关联”与“投入产出关联”来实现的。水平方向的关联溢出是由同一行业内各个企业之间的信息要素溢出影响。企业间互动与交流往往会导致“无意识扩散”“学习与模仿”“人力资本变动”等，企业可通过这些渠道得到本行业企业的有效信息与管理经验。技术关联溢出是指与其生产所需关键核心技术相的产业提供的先进生产方式和制造能力汇集引起的溢出效应，这种汇集所产生的区域规模效应更有利于为新兴产业的萌芽与发展提供空间。投入产出关联溢出是由置身于各条完整的产业链上的企业之间，由于上下游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领先经验与生产模式的传播与学习。

2.1.4 产业政策、空间溢出与产业演化的关系研究

产业演化主要呈现包括新兴产业出现、产业比例变化、传统产业退出、产业布局优化、产业内部分化等产业结构的变迁等表现形式。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一直以来都被广泛地认为是产业发展和演化的主导驱动力，而有关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与产业演化相互作用研究的理论和思想则主要是建立在对演化经济学的基础上。熊彼特首先从“演化”的视角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和过程，并在实践中创建了一种革命性的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性生产方式是指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和市场现实需求而产生的经济结构和市场调节的一种本质要素，产业的变化和市场需求结构调节的创新更多地强调对生产技术和方法、生产手段的创新，即技术革命性的创新。随后，在新古典时期的演化经济学的推动和影响下，一些新古典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学家逐渐放弃了对于新古典时期一种完全科学理性的研究和分析方法范式，转向用发展的眼光去研究这一时期政治和经济制度政策的发展。Nelson 有机地融合了传统的演化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并进一步提出了该体系可以被应用于一种“社会技术”，并将它们看成是一种在产业发

展和一种在产业演化模型中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由此可以看出,政府部门有关政策措施的改革和科技改革均不可或缺,对于推动和促进中国产业发展和演化具有较为重大的意义。

产业技术复杂程度越高,面对更为广阔的技术信息网络,推动相关产业进步所需的信息技术更趋于多元化,因此企业通常有必要处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联系中来取得广泛的信息与技术溢出。产品技术复杂度高的产业通常包括较多种类的中间投入品,生产的完成需要与许多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由此可以看出企业之间交流与合作的频率和程度对于不同技术复杂度产业的进步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具有更高技术复杂度的产业需要扩展匿名交易以建立广泛的社会和经济联系,以便从协作网络的扩展中受益。高技术复杂度产业会更多倾向于从多元化的企业间互动和相互协作中获取信息和机会,企业间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此通常会为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者提供灰色交易地带,从而导致此类产业出现违约风险的可能性和成本更高,也就是说,合作所面临的交易成本更高。因此,高技术复杂度产业更加依赖制度保障。此外,技术复杂度较高的产业中通常涉及更多的专用性资产,此类投资面临交易对手违约或被交易方“敲竹杠”的风险,因此,资产专用性高的产业也是机会主义更为严重的行业,具有较高的制度依赖性。

复杂产业的发展依赖优质的制度环境,并且需要更好的信任机制来支持企业之间的复杂互动。如果没有更有效的产业政策安排来建设相互信任基础,企业间合作与共同研发所隐藏的风险便难以弱化。在所需技术更为精细巧妙的产业中,相关企业之间建立彼此联系合作渠道是更加必要的,以确保信息紧密且隐性地交流,从坚守企业竞争力的领先地位角度来看是至关重要的。通常情况下,生产所需工艺更为多元的产业,其面向的市场活动参与主体范围也会更加广泛,且与其相关企业的生产分工会更加细化,协同合作频率也会更高。这对于企业创建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共同解决问题的机制非常重要,这种机制可帮助企业及时获得相关问题的反馈,从而提高企业学习和革新的质量与效率。

综上所述,各条空间溢出路径对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表现出非均衡性。复杂的技术领域通常依靠各个市场活动参与者协商与联合生产跨越难关,由此常常会依赖于有政策规范保障的企业关联网络,产业演化的有效性取决于紧密安全的企

业间区域网络关联之中，空间溢出至关重要。在技术复杂度较高的产业中，它们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具有更紧密技术关联的企业之间的互动机制，更为受益于技术关联路径的溢出，因此需要良好政府产业政策举措的支持。但是，政府产业政策对于两者都具有较强的调节效应，使得受空间溢出影响的具有不同技术复杂度的产业的发展似乎是不平衡的。

2.2 理论基础

政策的有效性体现于特定的经济环境中相关政策施行能否达到政府预设的产业政策目标，对其实施效果作出全面评估较为困难。在时间维度上，产业和异质性企业对要素配置变化的响应均存在滞后性，故产业政策对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的影响是中长期的。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产业对技术与要素的需求具有不可忽视的差异性，产业政策有效的条件也不同。在产业维度上，产业政策有效性受到要素使用结构与产业关联的影响，产业关联性越强，产业政策作用对象受关联产业的影响越大。产业政策的有效性难以通过单一产业的成功和失败来判断，近年来更多是从不同的角度或对总体经济的影响阐述产业政策有效性。本文选取长三角产业政策的出台与执行影响长三角地区空间溢出对产业演化的调控效果这一角度来体现长三角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2.2.1 产业政策对产业演化作用机制

全球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中，无论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还是处于追赶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产业政策。在经济原理分析上，既有关于产业政策有效性的论证，也有产业政策失败的分析。一方面，产业政策可以克服市场失灵与外部性；扶持更多具有发展潜力的初创企业，幼稚产业积极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也存在自身的非理性与获得信息的局限、政策的滞后性以及寻租行为的发生，导致产业政策的失败。

一方面，产业政策可以能够缓解或解决部分外部性与市场失灵(Stiglitz, 2015)。可以依靠设计合理且管理得当的政府产业政策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推动产业发展。

市场也并非万能,产业在快速发展时会面临着各种外部性、陌生领域的信息

不完整和不对称问题,经常会导致企业投资超出实际所需或者是一个项目投资需求量大而投资不足的现象,从而造成了出现产能严重过剩或是一个市场过度波动的情况;各类金融市场有待完善,例如针对某些行业的跨期金融市场、产品和服务不完整、企业很可能没办法完全地依靠这个市场来进行人力和资源的跨期配置;企业由于没有办法通过技术的自主运行来完成对于技术的应用、资源配置以及对于产品制造等方面的决策调整与协调,因此也就无法真正做到对于资源的最有效合理的配置(Rodrik, 1996)。

政府不仅能够将获得的产业整体信息优势和协调职能有效地运用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而且还能够通过产业政策将有限的资源分配给可以在技术创新与扩散中获得最大回报的产业,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最大的贡献。还可以在软硬件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充分地发挥其引导和协调的作用,以有效地克服市场的失灵、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林逸夫, 2017年)。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创新行为和创新成果的保护,解决了企业在技术上的创新和研究投入中的后顾之忧,使得企业能够全力以赴地进行科技创新和研发,对于产品的研制进行充分的投资。区域内企业之间的各种创新技术成果的间接碰撞与相互沟通交流所直接带来的沟通溢出反馈效应又同样间接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沟通溢出反馈效果,区域内企业间内部各种技术创新成果碰撞交流溢出反馈效应又同样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响应效果,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区域内外企业创新成果的产出与创新效率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区内企业的技术生产力和经营管理效率的快速增长,从而可以使得区内企业更多地充分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资源去积极参与投入到技术研发和产品生产中,推动和形成了促进区域内新产业快速增长的一个良性循环。还有就是可以通过对地方政府的专项监督检查来不断加快一步提高相关政策的贯彻落实和正确执行工作效率,缩短政策落实实施时间和工作滞后性,强化对相关政策的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

企业所能够取得的来源于国家或地方政府给予的社会扶持与经济支撑将更加有利于弥补其在市场机制中不能彻底解决的创新投入和外部性问题,完善的区域创新经济体系就是在其市场机制和各种社会因素的支配下,企业和个人的经济体系在其运行过程中难以内生形成,因此区域创新活动的建立和实施将对地方政府力量存在一定的内在依赖。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地补贴的方式来帮助

企业开展创新生产活动填补科研经费的缺口,促进企业的经营资本流动和循环,为企业创造和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比如创新生产必须的基础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设备、良好的政策环境、文化和教育环境,以及企业生产和创新必须的各种共性技能、知识和人才培训。一些技术创新研究开发工作短期很难获得一定的回报,研发工作周期相对比较长,所需的研发工作投入巨大,成功的概率也比较低,但是一旦开发成功便能够取得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些高新技术的开发真正需要地方政府的长期投入和扶持。

从中国现代产业发展生命周期的角度分析,在中国产业发展早期大量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市场内部竞争十分激烈,而在发展后期市场逐步趋于稳定,行业外企业进入和退出所付出的成本也较为高昂,因此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可以依照现代产业发展的各个阶段情况来研究和出台配套政府产业政策规范。从中国企业“自生能力”这一角度考虑出发,新结构经济学着重地强调了中国的产业政策制订应按照市场实际需求和要素禀赋的潜在比较优势实际情况决定,政府也同样应当积极帮扶那些本身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中国企业,消除因信息或者科学技术外部性与其他协调机制的失灵等原因带来的不良影响和经济增长障碍(林毅夫,2012)。如果我们能够充分考虑并做好与之相关整个产业政策的综合研究与整体设计和综合实施,那么我们就不仅可以根据幼稚产业政策发展的运行过程中“干中学”经济效应下所伴随的运营成本与各种外部性的成本变化,且可以使得产业补贴以更均衡的发放方式可以进行合理发放,逐步在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按需对中小企业经济扶持加大力度,直至这个产业在其所处行业内基本具备了一定的市场竞争能力(黄先海等,2015)。

同时这些产业政策优惠也被认为是一种能够有效地帮助扶持和鼓励中国更多具有巨大市场发展潜力的初创类企业,推动地方和区域创新效率的提高和创新方式的改革,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和市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促进政府机构增强解决就业难题的能力,与此同时扩大了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新兴企业在处于起步阶段时,相比其他国内或国外已经发展得较为齐全,并且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的成熟型企业,还是属于幼稚产业。对于一些具有较大的市场经济发展前景且对其所在地方或关联部门来说存在着不可估量的积极推动和促进作用的幼稚产业,在其最初的萌芽阶段,缺少了与成熟的企业相互竞争的能

力,政府部门可以通过采取一系列过渡性保护措施对企业进行产业政策扶持,直至最终使得它们自身发展成熟并且具备一定市场竞争力。政府通过产业政策举措来扶持幼稚产业。给第一个吃螃蟹的经营者和企业家适度的优惠与帮扶,使其能够积极地推动技术革新,推动产业发展进程(林毅夫,2017)。

另一方面,产业政策主要是一种通过政府机关搜集、加工的信息,根据各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定宏观目标,基于自身对各个区域行业产业发展现状的研究以及各个区域行业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预测,向众多或者个别行业发布有针对性的信号指引或者是计划性指令,以调节生产要素资源所在区域产业部门之间以及行业内各个企业之间的合理性配置,最终实现了推动产业规模与其产业结构向预先设定的目标形成状态进一步转换(Farla, 2015)。企业获得与同行业内企业有一定差距的来自政府的产业政策扶持引起的企业间生产要素资源错配,不利于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过程的良性竞争循环,扭曲了整个相关行业中企业核心技术方向的选择、进入或者退出市场等选择,引起整个生产网络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Restuccia 和 Rogerson, 2008);另一方面,市场机制有待建立完善或是市场摩擦同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间的人力资源与社会资本错配,影响范围涉及到整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企业在技术上的选择以及对于企业的进入与其退出市场的决策(Midrigan 和 Xu, 2014;Moll, 2014)。

政府在获取信息方面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处理信息过程也具有自身的非理性,政策的滞后性以及寻租行为的发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产业政策的失败。对产业政策持反对意见的一些专家人士认为,政府部门在制定新兴产业政策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资料滞后与实力欠缺等问题(Lall, 2013)。和充分了解市场内部形势的经营者相比,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并不能够持续保持完全的产业信息技术优势以及对于市场变化敏锐感知来采取相应配套措施;而且产业政策执行过程又存在被特定利益集团俘获的风险,产生寻租和腐败。尤其是以 GDP 增长速度作为衡量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绩效的首要指标,地方政府因为受迫于考核工作的压力,开展“逐底式”竞争,不仅严重地扭曲了其资源配置,还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以及公共物品偏离高效供给水平等诸多问题,甚至会引致中国产业政策的落空和失败。

2.2.2 产业政策、空间溢出与产业演化作用机制

尽管影响产业演化的机制错综复杂,产业演化始终与相关产业的关键技术进步,产能的增加密不可分。随着社会整体产品需求与生产日益多样化,产品技术含量提高,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产业间的联系网络愈加重要,通过网络所传递的信息与技术对于产业演化进程的推动作用更是不可忽视。企业网络关系中包括同行业竞争企业、合作企业、专业化供应商等,存在正式或非正式方式、纵向或横向等多种维度的互动交流。企业之间通过模仿同构、合作创新、技术扩散和其他形式,有助于增加创新的可能性、减少创新投入、降低创新难度。区域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市场信息会在区域内传播和交流,这样由区域内市场主体互动形成的网络对本地产业的演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地化的商品生产模式可以通过相互链接的区域生产网络来有效促进企业之间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和资源共享,有利于减少各个企业之间的贸易费用和交易中所面临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企业产生正向的外部经济(Meloetal, 2009)。

空间溢出依赖于企业间互动以实现空间相互作用,产业政策作为调节交易成本的重要条件,奠定了各个地区之间经济主体交流与互动的基准与模式。政府和市场职能的协调互补性就成了设计和管理新兴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产业政策对现实市场活动的正面影响和积极作用中的充分发挥,需要各级政府有足够的能提供坚定的支持,产业政策对中国新兴产业演化的积极影响也主要取决于新兴产业及企业能否依据我们国家的产业政策给出的信号,对其资源和人才进行相应的合理配置,以便逐步走向一个经济效率较高和投入产出潜力更大的工程项目和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和其所属地区,市场机制和产业政策体系在实践操作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更多的互补性。

政府和市场职能的协同与互补关系是产业政策的设计和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础。产业政策的正面作用要得到实际发挥,这就需要我们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必要的条件支持。产业政策对于产业演化的积极影响还应取决于企业能否依据自己的国家产业政策给出的信号,对其资源做出相应的合理配置,以便逐渐趋向于效率较高和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中去。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其实践操作的过程中,市场机制和产业政策机制之间呈现了更多的协调性和互补性。地方产业政策对于

产业演化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地方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当地经济的市场化水平越高,与其相关政策举措对于其产业升级与演化的促进作用就可能越大。

空间溢出一般会通过三条路径影响产业演化:“水平关联”“技术关联”与“投入产出关联”。各条路径对市场网络中企业的互动与联系有着不同的要求和深度。同样政府产业政策对各条路径空间溢出的调控效果也存在差异。具有共性生产要素需求的供应商、消费者等经济实体在生产网络的纵向维度上必须紧密联系,才能实现顺畅交流与良好合作,而紧密联系对于处于横向生产网络中的企业却并非如此。技术复杂度高的产业对多元的生产要素和专业技术需求较高,市场互动网络对其进步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也正因如此需要适度的产业政策奠定良好的互动基础。

一个企业在某个特定的市场或者行业的影响力不止取决于企业在这个市场或者行业中所处的相对地位,而且还要取决于这个企业的产品销售领域和范围以及它们在其他商品市场上的影响力(Edwards, 1955)。资源的基础观还特别强调,作为微观企业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与能力构筑,企业化管理和经营的具体执行取决于其现有的能力和资源禀赋(Guillén, 2000)。在产业政策的推动和引导作用下,受扶持企业更有可能借助“资源优势”通过加大对市场的支配力度以及降低其交易费用成本,充分利用可控企业资源,并为其下一步扩展提供发展空间。产业政策作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一个集中体现,通常是承担着引导资源与要素流动的重要责任(宋凌云和王贤彬, 2013)。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制定产业信贷政策的形式引导有限的产业信贷基金资源合理配给,为国家扶持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项目提供资金和产业政策导向,将有限的产业信贷资金合理地充分配置在具有更高边际效率的产业中,从而得以及时调整其现有产业结构,创新生产发展模式(林毅夫, 2010)。不同于未获得产业政策扶持的企业,受到地方政府扶持的企业可以获得更为广泛的机会、银行贷款特别是中长期借款也有可能向受扶持的企业倾斜(Chen et al., 2017),公司未来所需要面临的创新型项目投融资机遇也可能会日益增加,投融资的规模扩张得越快、地方政府给予的津贴规模和其他相关的减免额度也可能随之提高。

除了直接的扶持外,产业政策也可以间接通过支持微观企业的地方政府“扶持认证”来实现对被扶持企业的扶持效应。当面临一些具有较多的信息不对称性

的高新技术企业时,作为独立第三方的地方政府一般都会对其扶持企业进行投融资活动的行为造成明显的“认证效应”(李莉等,2015)。从中我们已经可以明显看到,接受国家产业升级政策性资金扶持的科技企业通常都很多是因为可以从产业资源配置导向和企业信息安全认证中迅速获取到较为丰富的产业资金和技术要素。相比之下,未通过当地财政部门政策性补贴项目贷款的中小企业所有人需要提前获得当地政府部门确认、批复贷款效率相对较低,获得商业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小额贷款的机会和低贷款利率企业贷款也相对较少,因此其企业经营风险就相对较大。市场捕捉到来自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中国商业银行等地方金融机构关于非产业集聚区企业个体经营者所可以获得的利率优惠和资源相对较少的消极信号,并且在其企业生存和发展中也可能同时存在着较大的市场不确定性和其他各种不可预见性,这将导致非产业集聚区企业个体经营者较难从中得到获得有效投入,签约经营成本的大幅提高,加剧其企业经营竞争环境的日益恶化。

政府对产业政策的执行是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国家宏观政策来调控企业获取的财务或者是税收补贴,低息贷款与其他税收的减免,影响该区域内各类企业的资源布局与结构,同时吸引优质企业向本地区汇集,吸引区域内企业向着国家政府产业政策的优惠所带动的行业领域发展,通过政府的有形之手与社会主义市场的无形之手,这样就实现了对资源的再配置。从产业层面上来看,产业政策也将是通过改善产业总体水平和将生产要素在上下游公司及同类型行业公司间再分配两种途径推动产业演化。其中促进的知识技术人才溢出效应有助于各个企业之间互相理解并交流学习和经营生产经验,有利于劳动力、资本的合理配置,彼此之间的竞争增强了企业的生产率和提升了区域性创新的效率。形成一种适用于区域内的专业化生产模式,不仅有利于促进区域内各类企业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与分享,知识的溢出也给企业提供了更广泛的信息环境条件和更便捷的市场贸易条件,降低了企业贸易的风险,共享劳动市场,形成具有比较完整产业链的综合性产业集群,带来了外部经济。

3 指标构建测算与数据说明

3.1 变量定义与说明

3.1.1 产业政策有效性的指标构建

产业政策的相关度量以及有关指标的界定一直以来处于不断探索和深入研究的阶段,在近期开展相关实证分析的课题研究时,选取包括政府产业补贴、利息支付以及企业免税期等多个企业层面的产业政策相关度量指标,或者通过逐条详细地解读“五年计划”来准确地识别和分析重点扶持产业,并从行业和时间两个维度之中引入一些哑变量。一方面,企业实际上能够获得更多的产业补贴,少量缴纳营业税额的事实可能并不完全是产业政策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产业政策指标只能作为一个企业实现上述政策指标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的激励条件。另一方面,因为产业规划政策文件中具体提出的扶持重点产业与时间节点有很大可能与扶持企业的具实际实践情况相距甚远,具有一定可能“放大”或“缩小”这些扶持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发展带来的直接影响。但是总体而言,五年发展规划仍然被认为是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关于研究制定国家产业发展战略以及对相关产业政策实施的基本纲领和具有一定指导性的重要政策文件,加之这些作为国家产业发展程度衡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已经被前人广泛地应用在研究中。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通过对样本范围内有关产业发展政策扶持进行讨论,在这个模型中选取了产业政策扶持的一个虚拟变量(*policy*),属于产业政策导向产业的,定义为对产业政策扶持的行业 *policy* 取得值为 1,反之即可取 0。

政府具体通过向企业规定偏差性税收以及提供补贴等产业政策措施对市场主体行为加以调控。为了推进产业升级,地方政府有动力制定导向型产业政策。通常,政府会针对不同产业部门实施非均衡的限制型或鼓励型政策措施,从本质上看,政府干预区域经济很有可能会扭曲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分配并破坏制度环境。如此,无助于改善企业之间的互动环境,同时削弱了其他地区空间溢出对本地产业演化的积极影响,从而限制了本地产业的升级。最终,既定目标为推动本地产业演化的政策在实践过程中没有达到理想效果,实施结果反而偏离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初衷,成为地区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根据江艇等(2018)的做法,本

文利用综合税率扭曲程度来测度长三角产业政策。

$$\text{企业综合税率} = \frac{\text{税收} - \text{补贴}}{\text{销售收入}} \quad \text{产业综合税率} = \frac{\text{产业总税收} - \text{产业总补贴}}{\text{产业总销售收入}}$$

$$\text{地区—产业标准差} = \sum \frac{\text{企业综合税率}}{\text{地区产业综合税率}} * \frac{\text{产业销售收入}}{\text{地区总销售收入}}$$

中国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优化资源配置的新旧经济发展动能转换期，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有转型经济体的影子。在此发展关键时期，市场化程度与地方保护主义也广泛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当地政府职能部门与市场主体在市场活动中的相对势力以及所享有的话语权与决定权，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当地市场化程度。为了达到促进本地产业发展的政绩目标，区域市场主体间的竞争与合作常常会受到来自政府职能部门的调控影响。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市场主体在生产要素配置上就具有更大的自主权，地区间经济交流与合作自主性就越强，区域间经济交流与互动频率也随之更高。若此时产业政策调控措施不当，生产要素分配不合理，往往会破坏竞争与合作发展的良性循环。地方保护主义较为片面地注重维护局部或本地区利益，可能存在地方政府滥用或消极使用手中权力，造成同一政策对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实施过程差异化，市场活动调控有失公平，破坏了地区间市场主体互动合作交流的基础即良好的契约环境，无形中竖起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之间的贸易壁垒，此类政策措施对区域一体化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采用樊纲等（2011）提出的市场化指数反映中国市场化改革特征，而且其中的分项指数之一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可以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参照指标。

此外，产业政策与长三角产业演化不可避免地存在内生性，长三角产业演化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政府有关部门修缮相关产业政策。为了尽可能消除内生性影响，本文参考毛琦梁和王菲（2020）的方法，选用1984年地区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测度产业政策。在改革开始阶段，本地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目的偏向于促进产业发展，并不是受地区产业演化影响。正因如此，公有制经济发展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

为缩小各个产业政策测度的量纲差异，在定量解释时便于比较，对产业政策所有测度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令其取值区间为0—1。

3.1.2 产业演化的指标构建

截止目前研究,产业演化概念主要有以下两种研究对象:一种就是专门被应用于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结构演化;另一种就是研究单个产业结构的变迁和演化。本文所指的产业演化是国家或区域产业结构的演化。本文采用长三角产业比较优势变动来测度产业演化,区位商是广泛使用的指标之一。

虽然学术界当前围绕产业政策制定与实施有效性产生了广泛的争论,但如何准确地衡量产业政策实施效果仍然充满挑战。评估产业政策实施有效性的难点主要在于:首先,我们不但需要高度地关注那些接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还需要深入研究产业政策对整个产业的直接与间接影响和效果。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只是局限在接受扶持的公司和产业,同时公司之间的有效信息和科技外溢都会对整个产业的绩效带来积极的影响。而对某些行业和企业进行政策扶持则无异于对其他行业 and 企业的歧视,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导致该行业内企业间的人力和资源发生错配,从而给该行业的整体经济效益带来负面影响。其次,产业政策可能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在进行产业政策成果考核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的选择性偏差。基于各种政绩预定目标,政府产业部门的政策扶持极大概率会有失公平。假设不将这种具有选择性的偏误纳入评价范围,就很可能得出从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阶段选择强者或是扶持薄弱企业的结论。最后,多样化的产业政策执行方式、被扶持企业自身的特点的差别,都会影响最终效果。

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区位商来衡量。在本文中,长三角特定产业的区位商大于一,则该产业在该区域具有比较优势。本文通过区位商衡量的比较优势是否发生晋级来测度产业演化。为此,作为一种稳健性检验,本文采用邻近地区最大区位商是否达到比较优势门槛值的二值变量,若相应的区位商大于1,则认定达到比较优势门槛值,设定为1,否则为0。考察期为2003—2009年,若2003年区位商小于0.1的产业在2009年大于1,则认定该产业实现了比较优势晋级。

3.1.3 控制变量

参考毛琦梁和王菲（2020）已有研究，选取以下控制变量。

1 产业生产能力禀赋。评估发展的目标产业和本区域当下资源禀赋、现有市场网络之间的适配情况，从而全面评估其目标产业发展所需基础与发展前景，产业生产能力禀赋越高，其适配情况越好，越有利于因地制宜推进目标产业演化进程。

$$den_{i,c,t} = \frac{\sum_K x_{i,c,t} \Phi_{c,k}}{\sum_K \Phi_{c,k}}$$

其中， $x_{i,c,t}$ 表示若 i 地区 c 产业区位商大于 1，则为 1，否则为 0，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其比较优势情况。 $\Phi_{c,k}$ 通过产业 c 与 k 在一个地区同时具有比较优势的条件概率度量产业 c 与 k 的技术邻近度， RCA_c 表示产业 c 是否具有显性比较优势。

$$\Phi_{c,k} = \min\{P(RCA_c|RCA_k), P(RCA_k|RCA_c)\}$$

2 投入产出关联。设定投入关联变量和产出关联两个变量。

$$input_{i,c} = \sum_{c \neq k} I_{c,k} \frac{E_{i,k}}{E_k}, output_{i,c} = \sum_{c \neq k} O_{c,k} \frac{E_{i,k}}{E_k}, io_{i,c} = input_{i,c} + output_{i,c}$$

产业 k 对产业 c 的单位总投入所占比重由 $I_{c,k}$ 表示； $O_{c,k}$ 为产业 c 单位总产出中用于产业 k 消费的比重； $E_{i,k}$ 为 i 地区 k 产业的总产值，k 产业在全国的总产出为 E_k 。因此， $input_{i,c}$ 可以说明 i 地区 c 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本地投入支持， $output_{i,c}$ 则表示本地产出需求。两个变量相关性非常高，为此将其加总为投入产出关联变量 $io_{i,c}$ 。

3 地区间产业经济嵌入程度。本文加入了产业结构相似度、投入产出与技术嵌入程度予以控制。区外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入本地将在一定程度上引起转入地区相应产业优势增强，因此加入地区间潜在产业转移变量，即当地产业中技术复杂度高于本地平均水平并且邻近地区相应产业技术复杂度低于该地平均水平的产业，将这类产业设定为 1，其他为 0。

4 交通可达性。交通便捷程度对溢出具有不可忽视的正向影响，采用某地到

其他地区最短通行时间距离的平均值来衡量。也将用本地到最近港口的通行时间距离表示的国际可达性变量加入模型中。市场消费需求情况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产业发展规模,加入市场潜力这一指标加以调节。利用本地区及其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空间加权值进行度量。

此外在模型中添加了地级地区虚拟变量与四位数产业门类虚拟变量以控制地区差异和产业差异,加入邻近地区产业政策变量控制溢出来源地特征对于空间溢出的影响。

3.2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旨在探索产业政策是否通过调控空间溢出促进产业演化,探讨了长三角产业政策对于不同溢出路径的影响,将长三角及其邻近地区划为研究对象,以除武器装备制造业之外的4位数制造业部门作为分析单元,产业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选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企业数据以尽量消除2003年后四位数行业分类变动的影响,同时由于所获数据2010年所获企业数据的缺失,研究期间设定为2003—2009年。其他资料均取自相应年份《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4 实证分析

4.1 产业政策与产业演化

4.1.1 模型构建

$$J_{i,c,T} = \alpha_1 Neighbor_{i_N,c,t_0} + \alpha_2 Neighbor_{i_N,c,t_0} \times Policy_i + \alpha_3 Policy_i + \beta_1 den_{i,c,t_0} + \beta_2 io_{i,c,t_0} + \delta_K \sum_k X_K + \varepsilon_{i,c}$$

$J_{i,c,T}$ 表示 T 时期内地区 i 的产业 c 演化状况。 $Neighbor_{i_N,c,t_0}$ 表示地区 i 的邻近地区 i_N 的产业 c 在初期 t_0 的显性比较优势。区位商的大小与地区总体制造业规模有关，两地间某产业区位商的具体数值差异未必能真正反映产业优势程度差异。作为一种稳健性检验，本文采用邻近地区最大区位商是否达到比较优势门槛值的二值变量，若相应的区位商大于 1，则认定达到比较优势门槛值，设定为 1，否则为 0。 den_{i,c,t_0} 表示 i 地区 c 产业在初期 t_0 所具备的生产能力禀赋，由此衡量地区 i 资源禀赋基础以及科技发展水平对长三角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从市场主体在区域网络上的经济合作与交流情况来看，市场主体间的投入与产出关系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区产业实况。正因如此，用投入产出关联变量 io_{i,c,t_0} 加以反映。 X_K 为影响产业演化的其他控制变量。

4.1.2 实证结果分析

表 4.1 基本回归结果

	(1)	(2)	(3)	(4)	(5)
policy		0.4362** (0.1911)	6.7621* (4.2255)	0.7030*** (0.2205)	6.7076* (4.2249)
Neighbor	0.0229** (0.0106)			0.0291*** (0.0109)	0.0895** (0.0392)
Neighbor_policy				-0.1031** (0.0440)	-0.1193* (0.0680)
den_local	27.0847***	27.8828***	28.2766***	27.1034***	27.3724***

	(6. 7265)	(6. 6974)	(6. 6930)	(6. 7392)	(6. 7272)
io_local	3. 6961***	3. 6470***	3. 7013***	3. 6594***	3. 6722***
	(0. 5171)	(0. 5181)	(0. 5166)	(0. 5183)	(0. 5180)
port	-1. 0277***	-1. 0753***	-0. 6046***	-1. 0623***	-0. 6020***
	(0. 3060)	(0. 3064)	(0. 1781)	(0. 3066)	(0. 1786)
accessibilit	-1. 7287***	-1. 8093***	-1. 5248***	-1. 7623***	-1. 4622***
y	(0. 3686)	(0. 3681)	(0. 2973)	(0. 3693)	(0. 2988)
mp	-1. 3907***	-1. 4393***	-1. 4075***	-1. 4181***	-1. 3783***
	(0. 2589)	(0. 2585)	(0. 2551)	(0. 2590)	(0. 2557)
cor_structre	2. 0250**	2. 1319**	2. 1343**	1. 9597**	1. 9334**
	(0. 8078)	(0. 8077)	(0. 8081)	(0. 8093)	(0. 8118)
cor_io	-0. 3593	-0. 3942	-0. 4094	-0. 3637	-0. 3624
	(0. 2767)	(0. 2773)	(0. 2801)	(0. 2770)	(0. 2797)
cor_tech	0. 1502	0. 1509	0. 1676	0. 1569	0. 1503
	(0. 4785)	(0. 4794)	(0. 4814)	(0. 4790)	(0. 4811)
transfer	0. 4162**	0. 4212**	0. 4211**	0. 4194**	0. 4135**
	(0. 1952)	(0. 1952)	(0. 1951)	(0. 1955)	(0. 1954)
inst_tax_nb			-0. 4340		-0. 6284
			(1. 8326)		(1. 8396)
_cons	35. 6216***	37. 3977***	25. 8358***	25. 8358***	24. 8257***
	(8. 8841)	(8. 8855)	(6. 1088)	(6. 1088)	(6. 1363)
<i>N</i>	8448	8448	8448	8448	8448
pseudo <i>R</i> ²	0. 1336	0. 1337	0. 1328	0. 1356	0. 1342

在本节中，首先基于整个样本使用基准模型式执行 logit 回归，回归结果总结在表 4.1 中。结果显示长三角周边地区相应产业的比较优势通过地区互动与交流对长三角产业演化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即相邻地区的相应产业比较优势会通过溢出推动本地产业演化进程。在本次实证分析中，长三角产业演化程度是由本地相应产业比较优势变动情况来度量的。第(1)列中未引入产业政策相关变量，只考虑空间溢出对产业演化的影响，把邻近地区产业比较优势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估计。结果中其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区域间空间溢出对产业演化产生在 5%水平上显著正向的影响效应。表明区域空间溢出对产业演化产生具有一定的积极正向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长三角周边地区相应产业的比较优势越明显，其通过地区互动与交流对长三角产业演化产生的正向促进作用也随之增加，即相邻地区的相应产业比较优势会通过溢出推动本地产业演化进程。表 4.1 第(2)、(3)列中只考虑相关产业政策对产业演化的作用，分别引入产业政策虚拟变量与综合税率扭曲程度表示政策扶持。第(2)列中通过产业政策扶持的虚拟变

量衡量的产业政策的实施对产业演化产生在 5%水平上显著正向的影响效应。由此表明长三角产业政策的实施对产业演化也具有积极正向的作用。第(3)列中显示了由综合税率扭曲程度衡量的产业政策的实施在 10%水平上对长三角相应产业显著正向的影响效应。验证了相关产业政策的实施会对长三角产业演化产生积极正向的促进作用。

为了考察产业政策与对空间溢出共同作用对长三角产业演化的影响,表 4.1 中第(4)、(5)列同时引入产业政策与空间溢出以及其交互项(Neighbor×Policy),分别显示了由产业政策扶持的虚拟变量衡量的产业政策以及由综合税率扭曲程度衡量的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结果显示:第(4)列中产业政策虚拟变量与邻近地区产业比较优势变量估计系数都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第(5)列中税率扭曲程度变量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正,与邻近地区产业比较优势变量估计系数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显著性比单独引入时相比甚至更强,可能因为产业政策与空间溢出混合使用对相应产业演化促进效果会更明显。而实施产业政策的效果和空间溢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产业政策虚拟变量与邻近地区优势产业的空间溢出交互项估计系数为-0.1031,也就是说在控制周围地区产业发展程度的条件下,长三角区域相关产业的支持每增加 1 个单位,长三角相应产业演化所能获得的空间溢出效应约降低 1.10 倍 ($[\exp(0.10)]$)。综合税率扭曲程度与邻近地区优势产业的空间溢出交互项估计系数为-0.1193,也就是说在控制周围地区产业发展程度的条件下,长三角区域相关产业的税率扭曲程度提高 1 个单位,长三角相应产业演化所能获得的空间溢出效应约降低 1.13 倍 ($[\exp(0.12)]$)。这提醒我们注意到在长三角相应产业政策实施与促进空间溢出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政府相关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现实中产业发展,市场交流活动不适配的问题,这种不适配对长三角产业演化具有不可忽视的阻碍效果。

4.1.3 稳健性检验

表 4.2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1)	(2)	(3)	(4)	(5)
Neighbor2	0.2679*** (0.0935)	0.2689*** (0.0935)	0.2681*** (0.0935)	0.0127* (0.0354)	0.0427** (0.0239)
Neighbor2_Policy		-1.4033** (0.5546)	-1.0398*** (0.3067)	-0.7634** (0.3807)	-0.0343 (0.0439)

Policy		6.5733 (4.2292)	1.0185** (1.4059)	1.7616* (1.2690)	3.9246** (2.6560)
den_local	26.9394*** (6.7250)	26.9394*** (6.7250)	26.9394*** (6.7250)	26.6459*** (6.7327)	27.2014*** (6.7604)
io_local	3.6654*** (0.5174)	3.6654*** (0.5174)	3.6654*** (0.5174)	3.6645*** (0.5174)	3.6842*** (0.5229)
mp	-1.3836*** (0.2588)	-1.3836*** (0.2588)	-1.3836*** (0.2588)	-1.0989*** (0.2336)	-1.0736*** (0.2473)
cor_structre	1.9243** (0.8081)	1.9243** (0.8081)	1.9243** (0.8081)	1.9533** (0.8067)	2.1781*** (0.8242)
cor_io	-0.3428 (0.2765)	-0.3428 (0.2765)	-0.3428 (0.2765)	-0.2779 (0.2790)	-0.3562 (0.2805)
cor_tech	0.0996 (0.4779)	0.0996 (0.4779)	0.0996 (0.4779)	0.4507 (0.5005)	-0.0354 (0.5256)
transfer	0.4129** (0.1953)	0.4129** (0.1953)	0.4129** (0.1953)	0.4224** (0.1952)	0.3803* (0.1993)
_cons	34.8662*** (8.8889)	34.8662*** (8.8889)	34.8662*** (8.8889)	27.0431*** (6.5048)	27.6693*** (6.3067)
N	8448	8448	8448	8448	8448
pseudo R2	0.1343	0.1343	0.1328	0.1356	0.1333

对表 4.1 中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在本次实证分析中，长三角产业演化程度采用邻近地区相应产业最大区位商显性比较优势的二值变量来度量。同样第(1)列中未引入产业政策相关变量，只考虑空间溢出对产业演化的影响，把比较优势的二值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估计，观察其结果是否与表 4.1 中一致。结果中其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区域间空间溢出对产业演化产生在 1%水平上显著正向的影响效应。验证了临近地区优势产业对本地相应产业的演化有益，区域空间溢出对产业演化产生具有一定的积极正向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长三角周边地区相应产业的比较优势越明显，其通过地区互动与交流对长三角产业演化产生的正向促进作用也随之增加，即相邻地区的相应产业比较优势会通过溢出推动本地产业演化进程。

为了验证产业政策与对空间溢出共同作用对长三角产业演化的影响，表 4.2 第(2)、(3)列中同时引入产业政策与空间溢出以及其交互项，分别引入产业政策扶持虚拟变量与综合税率扭曲程度表示政策调控以及产业政策与空间溢出的交互项。结果显示：第(2)列中比较优势的二值变量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产业政策虚拟变量估计系数不显著，第(3)列中税率扭曲程度变量在在 5%水平上

显著为正，与邻近地区比较优势的二值变量估计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显著性比单独引入时相比甚至更强，可能因为产业政策与空间溢出混合使用对相应产业演化促进效果会更明显。而实施产业政策的效果和空间溢出交互项系数仍显著为负，产业政策虚拟变量与比较优势的二值变量交互项估计系数为-1.4033，也就是说在控制周围地区产业发展程度的条件下，长三角区域相关产业的支持每增加 1 个单位，长三角相应产业演化所能获得的空间溢出效应约降低 4.05 倍（ $[\exp(1.4)]$ ）。综合税率扭曲程度与邻近地区优势产业的空间溢出交互项估计系数为-1.0398，也就是说在控制周围地区产业发展程度的条件下，长三角区域相关产业的税率扭曲程度提高 1 个单位，长三角相应产业演化所能获得的空间溢出效应约降低 2.8 倍（ $[\exp(1.03)]$ ）。

采取其他产业政策度量指标对表 4.1 中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4.2 第(4)、(5)列中同时引入产业政策与空间溢出以及其交互项，分别引入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比重表示政策调控以及产业政策与空间溢出交互项。结果显示：第(4)列中比较优势的二值变量估计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正，政府与市场关系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正，实施产业政策的效果和空间溢出交互项系数仍显著为负，政府与市场关系变量与比较优势的二值变量交互项估计系数为-0.7634，也就是说在控制周围地区产业发展程度的条件下，长三角区域相关产业的支持每增加 1 个单位，长三角相应产业演化所能获得的空间溢出效应约降低 2.14 倍（ $[\exp(1.4)]$ ）。第(5)列中国有企业比重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与邻近地区比较优势的二值变量估计系数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产业政策与空间溢出交互项虽不显著，但仍显示负向关系，与前述结论基本一致。再次提醒我们注意到在长三角相应产业政策实施与促进空间溢出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政府相关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现实中产业发展，市场交流活动不匹配的问题，这种不匹配对长三角产业演化具有不可忽视的阻碍效果。亟需加快关键产业领域的人力、物质供给增长速度转换来优化综合配置，完善相关市场体制以及各条产业链配套设施，减少对区域产业发展呈负向影响的市场摩擦，促进长三角的产业演化。

4.2 产业政策、空间溢出与产业演化

4.2.1 模型构建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考察产业政策通过影响行业内企业间互动与产业间前后向关联对长三角产业演化的影响，借鉴已有文献，将基本计量模型设定为：

$$\begin{aligned}
 J_{i,c,T} = & \alpha_{11}ss_hor_{i,N,c,t_0} + \alpha_{12}ss_tech_{i,N,c,t_0} + \alpha_{13}ss_io_{i,N,c,t_0} + \alpha_{14}ss_hor_{i,N,c,t_0} \times Policy_i \\
 & + \alpha_{15}ss_tec_{i,N,c,t_0} \times Policy_i + \alpha_{16}ss_io_{i,N,c,t_0} \times Policy_i + \alpha_{17}Policy_i \\
 & + \beta_{11}den_{i,c,t_0} + \beta_{12}io_{i,c,t_0} + \delta_K \sum_k X_K + \varepsilon_{i,c}
 \end{aligned}$$

其中， ss_hor_{i,N,c,t_0} 为水平关联溢出，用产业创新指数表示，用来测度一定区域内同一行业内各个企业之间的信息要素溢出影响； ss_tec_{i,N,c,t_0} 是指与产业*i*生产所需关键核心技术相的产业提供的先进生产方式和制造能力汇集引起的溢出效应，这种汇集所产生的区域规模效应为产业*c*萌芽与发展提供的支持；计算方法如式： $ss_tech_{i,c} = \sum_{c \neq k} \phi_{c,k} \frac{E_{i,k}}{E_k}$ 。 ss_io_{i,N,c,t_0} 为产业*c*置身的各条完整的产业链上的企业之间，由于上下游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领先经验与生产模式的传播与学习，产生的投入产出关联溢出。以上路径设置汇总了影响产业演化的可能发展方向。

4.2.2 实证结果分析

表 4.3 回归结果

	(1)	(2)	(3)	(4)	(5)
ss_tech	1.8099* (1.1823)	1.8704 (1.2009)	4.9139 (3.2124)	0.3204 (3.0635)	2.8303 (2.2471)
ss_io	1.0263** (0.4146)	1.1632*** (0.4309)	1.0236 (0.6727)	0.0143 (1.3685)	0.8641 (0.8968)
ss_hor	0.0491* (0.0473)	0.0558* (0.0490)	0.2209** (0.0973)	0.9467** (0.4275)	0.3634** (0.1566)
ss_tech _Policy		-1.2913* (2.5022)	-6.1866** (5.9205)	2.9172 (4.4389)	-2.2386* (4.2365)
ss_io _Policy		-1.5912* (1.0626)	-0.0007* (1.3360)	-1.4302** (1.7728)	-0.1953 (1.5364)

ss_hor		-0.0689	-0.4180	-0.3710	-0.5522*
_Policy		(0.1464)	(0.2104)	(49.5457)	(0.2774)
Policy		1.2732	6.8736	-2.4122	-2.2655
		(0.8660)	(4.6571)	(2.0207)	(3.1300)
den_local	27.7382***	28.0699***	28.2205***	-2.2655	28.4893***
	(6.9101)	(6.9260)	(6.9294)	(3.1300)	(6.9401)
io_local	3.5724***	3.5685***	3.6471***	3.5553***	3.6487***
	(0.5370)	(0.5377)	(0.5392)	(0.5378)	(0.5391)
mp	-1.3389***	-1.3389***	-1.3495***	-1.1046***	-1.1245***
	(0.2633)	(0.2633)	(0.2603)	(0.2388)	(0.2537)
port	-0.8657***	-0.8657***	-0.5231***	-0.7487***	-0.6419***
	(0.3150)	(0.3150)	(0.1836)	(0.2351)	(0.1945)
accessibility	-1.4992***	-1.4992***	-1.2437***	-1.2882***	-1.2354***
	(0.3889)	(0.3889)	(0.3259)	(0.3509)	(0.3171)
cor_structre	1.5078	1.5078	1.6467*	1.4297	1.5742
	(0.9719)	(0.9719)	(0.9950)	(0.9768)	(0.9824)
cor_io	-0.5582*	-0.5582*	-0.5696**	-0.4152	-0.6066**
	(0.3020)	(0.3020)	(0.3099)	(0.3096)	(0.3082)
cor_tech	-0.2548	-0.2548	-0.2544	0.0529	-0.3167
	(0.5123)	(0.5123)	(0.5154)	(0.5378)	(0.5532)
transfer	0.3221	0.3221	0.3340	0.3223	0.3319
	(0.2096)	(0.2096)	(0.2099)	(0.2099)	(0.2098)
_cons	30.1548***	30.1548***	20.0519***	26.4540***	23.7417***
	(9.3157)	(9.3157)	(6.8532)	(7.8939)	(6.9067)
N	7943	7943	7943	7943	7943
pseudo R2	0.1329	0.1329	0.1343	0.1349	0.1341

为了考察产业政策对各条空间溢出的调控作用程度,以及以上因素对长三角产业演化的影响,在本部分实证分析中,长三角产业演化程度采用本地相应产业比较优势变动情况来度量,考察不同产业政策度量标准下,以及产业政策与各条空间溢出的相互作用对长三角相应产业演化的影响。第(1)列中未引入产业政策相关变量,只考虑各条空间溢出路径对长三角产业演化的影响,把邻近地区产业比较优势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估计。技术与水平关联溢出对长三角产业演化均在10%水平存在上显著正向的影响效应。投入产出对长三角产业演化则在5%水平上显著正向的影响效应。也就是说,长三角与周边地区相应产业市场主体的互动与交流渠道越畅通,其通过地区互动与交流对长三角产业演化产生的正向促进作用也随之增加,即相邻地区的互动与交流会通过溢出推动本地产业演化进程。

第(2)、(3)列同时引入产业政策与空间溢出路径交互项,分别显示了由税率扭曲和产业政策扶持的虚拟变量衡量的产业政策与各条空间溢出路径共同作用下对长三角相关产业演化的影响。结果显示:第(2)列中税率扭曲与技术和投入产出空间溢出路径的估计系数都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从实证角度揭示了长三角产业政策对空间溢出路径的调控作用,长三角区域相关产业的税率扭曲程度提高1个单位,长三角相应产业演化所能获得的技术空间溢出效应约降低1.29倍,所能获得的投入产出空间溢出效应约降低1.59倍。税率扭曲与水平空间溢出路径的估计系数是-0.07,不显著但为负,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税率扭曲的负面影响。第(3)列中产业政策虚拟变量与技术和投入产出空间溢出路径的估计系数都分别在5%、10%水平上显著为负,与水平空间溢出路径的估计系数是-0.42,不具有显著性,可能因为处于同一产业领域内的企业之间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且相互之间的人才要素,生产要素流动对其信息的获得,创新生产方法的学习都较为容易,水平关联溢出的重要性在不同技术含量产业间的差异性不太明显。

为保证上述结论的稳健性,在本次实证分析中,运用其他产业政策代理变量为基础进行检验。在第(4)列中,引入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作为产业政策衡量指标,第二条溢出路径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与前述结果相比,显著性增强,但其技术与水平关联估计系数不显著。在第(5)列中,引入国有企业产值比重作为产业政策衡量指标,其与“投入产出关联”的交互项估计系数为-0.20,为负且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改革初始经济复苏阶段,相关产业尚未形成广泛的生产要素需求与市场联系,相关产业政策也不够匹配,因此受产业政策调控影响不明显。但总的来看,技术关联和投入产出关联溢出高度依赖于企业间的紧密互动,显著受到产业政策的调节;水平关联溢出对企业间互动的依赖程度较低,受产业政策的调控较少。

产业技术复杂程度越高,面对更为广阔的技术信息网络,推动相关产业进步所需的信息技术更趋于多元化,因此通常有必要处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联系中来取得广泛的信息与技术溢出。由此可以看出企业之间交流与合作的频率和程度对于不同技术复杂度产业的进步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市场互动中,产品所包含技术水平越高,其生产所需要素的供应商分布就更为广泛,也就是说该产业处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联系中来取得广泛的信息与技术溢出。因此区域现有产业多元化程

度，也是影响产业发展潜力和产业技术含量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不同角度的空间溢出路径对企业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有各异的需求和深度。同样，同一产业政策对不同空间溢出路径的监管与规制影响会有所不同。随着产业发展的技术要求不断提高，产业链不断延伸，基于地区间协作的经济空间组织网络对产业演化至关重要。其构建与顺利运行必须依赖于产业政策保障。同一产业政策对不同空间溢出路径的监管与规制影响会有所不同。从上下游生产链的纵向维度来看，生产要素供应商、生产者、最终消费者之间，甚至拥有研发共性内容环节的经济实体均需通过区域网络互通交流来实现生产与流通环节的资源最大化利用以及更高效的产出。对于横向维度的企业之间却并非如此，处于同一产业领域内的企业之间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且相互之间的人才要素，生产要素流动对其信息的获得，创新生产方法的学习都较为容易，水平关联溢出的重要性在不同技术含量产业间的差异性不太明显。

5 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使用 2003—2009 年长三角制造业企业数据,将研究范围定在长三角以及其邻近地区,旨在通过分析研究长三角地区产业政策、空间溢出与产业演化之间的关系,探讨长三角产业政策有效性。通过研究长三角产业政策、空间溢出与产业演化之间关系,从政府与市场功能互补性视角探讨了长三角产业政策有效性。本文不仅深入地思考了政府要不要实施产业政策,而且也验证了长三角产业政策在区域间“水平关联”、“技术关联”与“投入产出关联”之间的调整,以及其对长三角产业演化的作用和影响,并尝试了为各级政府部门在长三角地区合理制订与执行产业政策提供一些相关建议。

本文实证结果显示,地区间会通过“水平关联”、“技术关联”与“投入产出关联”三条路径的空间溢出促进地区产业演化,产业政策对不同的空间溢出路径调控作用不同。不同角度的空间溢出路径对企业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有各异的需求和深度。同样,同一产业政策对不同空间溢出路径的监管与规制影响会有所不同。随着产业发展的技术要求不断提高,产业链不断延伸,基于地区间协作的经济空间组织网络对产业演化至关重要。其构建与顺利运行必须依赖于产业政策保障。因此为产业政策有效性争论提供了经验证据,并分析了产业政策施政的合理路径,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

首先,政府应该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致力于制定出符合市场实际需求的政策模式以配合市场,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职能的相互协调和互补。在技术创新方面,实证结果显示产业政策会显著影响来自技术和投入产出关联路径的空间溢出,处在纵向上下游产业链或者具有共同科研资源需求的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生产要素交换与有效信息获取都需要通过区域网络来实现。良好的市场运行机制无法靠市场运行自发形成,其良好运行需要政府产业部门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提供保障。政府应在提供创新所需基础设施与基础研发方向提供支持,甚至设置国家基础科研平台提供公共技术服务。多调研,切实了解市场动向与市场需求,发展具有市场潜力与正向外部性的产业,因地制宜发展适合本地的产业。为具有正向外部性的初创企业适当提供启动资金助其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企业,促进地区产业技术水平提高。

其次,产业政策实际应用中应与市场竞争形成协调互补关系,提高执法透明

度，尽量避免形成对于市场行为的扭曲。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营造良好地区产业政策环境，提高区外市场主体对本地制度环境的信任，为地区间良好长期互动与合作奠定良好政策基础，形成良性循环。长三角在制定与实施一体化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增长和深化改革等相产业政策时，优化和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规划设计与项目管理，我们仍然需要充分发挥好新兴产业的扶持政策在有效地弥补新兴市场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缺陷的重要作用。

最后，由于同一产业政策对不同空间溢出路径的调节与规制影响会有所不同。从上下游生产链的纵向维度来看，市场活动参与者均需通过区域网络互动交流来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技术关联与投入产出关联两种空间溢出路径更容易积极有效的产业政策正向引导作用。政府应致力于及时洞悉市场发展现状，构建政府信息平台，为市场网络的良好运转提供政策支持，为市场主体交流与互动提供便利，最大化发挥空间溢出对地区产业演化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 [1] Aghion, P., Cai, J., Dewatripont, M., Du, L., Harrison, A., and Legros, P., 2015, Industri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7(4):1—32.
- [2] Boschma, R., A. Minondo, and M. Navarro. The Emergence of New Industries at the Regional Level in Spain: A Proximity Approach based on Product Relatedness [J]. *Economic Geography*, 2013, 89(1):29-51.
- [3] Boschma, R., V. Martín, and A. Minondo. Neighbour Regions as the Source of New Industries [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17, 96(2):227-245.
- [4] Breschi, S., and F. Lissoni. Localised Knowledge Spillovers vs. Innovative Milieux: Knowledge “Tacitness” Reconsidered [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01, 80(3): 255-273.
- [5] Caragliu, A., and P. Nijkamp. Space and Knowledge Spillovers in European Region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Forms of Proximity on Spatial Knowledge Diffus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16(3):749-774.
- [6] Coe D. T., E. Helpman, and A. W. Hoffmaister.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and Institutions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9, 53(7):723-741.
- [7] Denicolai S, A. Zucchella, and G. Cioccarelli. Reputation, Trust and Relational Centrality in Local Networks: An Evolutionary Geography Perspective [A]. Boschma, R., and R. Martin. *Th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C].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0.
- [8] Dumais G, G. Ellison, and E. L. Glaeser.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as a Dynamic Process [J].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2002, 84(2):193-204.
- [9] Ethiraj, S. K. Allocation of Inventive Effort in Complex Product System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28(6):563-584.
- [10] He, C, S. Zhu, X. Hu, and Y. Li. Proximity Matters: Inter-regional Knowledge Spillover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 in China [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19, 110(2):173-190.
- [11] Hidalgo, C. A., B. Klinger, A. L. Barabási, and R. Hausmann. The Product Space

-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J]. *Science*,2007, 317(5837):482-487.
- [12] Hidalgo,C. A.,and R. Hausmann. The Building Blocks of Economic Complexity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09,106(26):10570-10575.
- [13] Hobday,M. Complex System vs. Mass Production Industries:A New Innovation Research Agenda [R].Paper Prepared for CENTRIM/SPRU/OU Project on Complex Product Systems,1996.
- [14] Jaffe,A. B.The Importance of Spillovers in the Policy Mission of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Program [J].*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1998,23(2):11-19.
- [15] Kokko,A.Technology,Market Characteristics,and Spillovers [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0,43(2):279-293.
- [16] Lavigne,S.,and D.Nicet -Chenaf. Out of Sight,Out of Mind:When Proximities Matter for Mutual Fund Flows[J]. *Economic Geography*,2016,92(3),322-344.
- [17] Los,B. The Empirical Performance of a New Inter-industry Technology Spillover Measure[A].Saviotti,P.,and B. Nooteboom.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C]. 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0.
- [18] 党兴华, 弓志刚. 多维邻近性对跨区域技术创新合作的影响——基于中国共同专利数据的实证分析[J]. *科学学研究*, 2013, (10) :1590-1600.
- [19] 韩剑, 郑秋玲. 政府干预如何导致地区资源错配——基于行业内和行业内错配的分解[J]. *中国工业经济*, 2014, (11) :69-81.
- [20] 贺灿飞, 任永欢, 李蕴雄. 产品结构演化的跨界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地级市出口产品的实证分析[J]. *地理科学*, 2016, (11) :1605-1613.
- [21] 黄玖立, 周璇. 定制化与地方保护主义:经验证据及对自贸区建设的启示[J]. *管理世界*, 2018, (12) :56-66.
- [22] 葛鹏, 魏婧恬, 王健. 诚信环境、制度依赖度与产业的比较优势[J]. *财经研究*, 2016, (9) :99-109.
- [23] 黄贇琳, 王敬云. 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来自中国的经验数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06, (2) :60-67.
- [24] 江艇, 孙鲲鹏, 聂辉华. 城市级别、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错配[J]. *管理世界*, 2018, (3) :38-50.

- [25] 李雪灵, 蔡莉, 龙玉洁, 申佳, 张玲. 制度环境对企业关系构建的影响: 基于中国转型情境的实证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8, (5): 41-50.
- [26] 刘凤委, 李琳, 薛云奎. 信任、交易成本与商业信用模式[J]. 经济研究, 2009, (8): 60-72.
- [27] 龙小宁, 王俊. 中国司法地方保护主义: 基于知识产权案例的研究[J]. 中国经济问题, 2014, (3): 3-18.
- [28] 毛琦梁, 王菲. 地区比较优势演化的空间关联: 知识扩散的作用与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 (11): 136-154.
- [29] 毛其淋, 许家云. 跨国公司进入与中国本土企业成本加成——基于水平溢出与产业关联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6, (9): 12-32.
- [30] 潘文卿, 李子奈, 刘强. 中国产业间的技术溢出效应: 基于 35 个工业部门的经验研究[J]. 经济研究, 2011, (7): 18-29.
- [31] 邵朝对, 苏丹妮. 全球价值链生产率效应的空间溢出[J]. 中国工业经济, 2017, (4): 94-114.
- [32] 毛琦梁, 王菲. 制度环境、技术复杂度与空间溢出的产业间非均衡性[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05): 118-136
- [34] 宋凌云, 王贤彬. 重点产业政策、资源重置与产业生产率[J]. 管理世界, 2013(12)
- [35] 张曙光. 市场主导与政府诱导——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J]. 经济学(季刊), 2013(03)
- [36] 胡森林, 曾刚, 滕堂伟, 庄良, 刘海猛, 孙蓉. 长江经济带产业的集聚与演化——基于开发区的视角[J]. 地理研究, 2020, 39(03): 611-626.
- [37] 干春晖, 郑若谷, 余典范.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11(05)
- [38] 李英, 赵越, 潘鹤思. 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与产业演化关系研究综述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6, 33(24): 154-160.
- [39] 江飞涛, 李晓萍. 直接干预市场与限制竞争: 中国产业政策的取向与根本缺陷[J]. 中国工业经济, 2010(09)

- [40] 孙晓华, 王昀, 刘小玲. 范式转换、异质性与新兴产业演化[J]. 管理科学学报, 2016, 19(08):67-83.
- [41] 潘士远, 金戈. 发展战略、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变迁——中国的经验[J]. 世界经济文汇. 2008(01)
- [42] 王少永, 霍国庆, 孙皓, 杨阳.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生命周期及其演化规律研究——基于英美主导产业回溯的案例研究[J]. 科学学究, 2014, 32(11):1630-1638.
- [43] 盛仕斌, 徐海. 要素价格扭曲的就业效应研究[J]. 经济研究, 1999, (5):68-74.
- [44] 唐任伍, 唐天伟. 区域间地方政府运行效率测度:2000~2009[J]. 改革. 2011(07) 2002, (10):59-70.
- [45] 郭晔, 赖章福. 政策调控下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04)
- [46] 刘伟, 张辉, 黄泽华. 中国产业结构高度与工业化进程和地区差异的考察[J]. 经济学动态. 2008(11)

后 记

时光匆匆如流水，从选题到论文的顺利完成，一直都离不开老师、同学、朋友给予我的热情帮助，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在此我向所有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三年的辛勤栽培，感谢你们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给我们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导师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崇高风范对我影响深远。不仅让我们认识到基本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还告诉我们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本次论文从选题到完成，每一步都是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顺利完成。在此，谨向导师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在校学习期间所收获的不仅仅是愈加丰厚的专业知识，更多的是在阅读、实践中所培养的思维方式、表达能力和广阔视野。十分感恩这三年来我遇到的每一个人，无论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中，都给予了我及时的帮助和热心的照顾，让我在一个充满温暖的环境中度过三年。

最后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感谢我人生的第一位导师在我求学道路上给予我的理解与支持。你们是我坚强的后盾，让我可以放心大胆地迈出前进的脚步。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定更加努力地学习和工作，不辜负父母对我的殷殷期望！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是我少年时最喜欢的诗句。就用这话作为这篇论文的一个结尾，也是一段生活的结束。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少年时的梦想，永不放弃。